

從觀念的軌跡探究知識分子角色於國家 領域內外之游移：

以臺灣外省籍知識分子為例

路丹妮^{*}

摘 要

根據卡爾·曼海姆 (Karl Mannheim) 所提出的知識社會學理論，本文使用批判性話語，分析研究在 1935 年至 1949 年之間在臺灣的三位中國大陸省籍的人——范壽康、曾今可和李季谷，所撰寫的文章。這些中國知識分子被視為當代社會群體的代表和知識的載體者，通過識別其中的關鍵概念和嵌入這些概念的更廣泛的語義場，本文不僅分析了每個作者的個人智力發展，更揭露了主導民國社會後期，並得到不同社會群體認可的主流意識形態。

關鍵字：意識形態、知識社會學、文化保守主義、馬克思主義論述、五四運動

* 作者現為捷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研究員。

Trajectories of Ideas and the Role of Intellectuals within and outside the State:

Mainland Intellectuals in Taiwan

Táňa Dluhošová^{*}

Abstract

Following Karl Mannheim's theory of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this article use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o scrutinize texts written between 1935 and 1949 by three Mainland Chinese in Taiwan, Fan Shoukang, Zeng Jinke, and Li Jigu. Thes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re treated as representatives of contemporaneous social groups and bearers of knowledge. By identifying the key concepts and the broader semantic fields in which they are embedded, the article not only analyzes each author's individual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but also unearths prevailing ideologies which dominated late Republican society and were endorsed by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Keywords: ideology, propaganda, sociology of knowledge, cultural conservatism, Marxist discourse, May Fourth Movement

* Research Fellow, Oriental Institute, Czech Academy of Sciences

從觀念的軌跡探究知識分子角色於國家 領域內外之游移： 以臺灣外省籍知識分子為例^{*}

路 丹 妮

一、緒論

某個特定時期的世界觀之內涵為何，這些觀點所扮演的角色又為何？知識作為一種由意識形態所驅使、對於世界的理解與掌握，又如何建構社會？個人作為這類知識的載體，他們與代表著不同世界觀的社會群體彼此之間的關係又為何？跟隨德國社會學家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1893-1947）所發展的知識社會學的研究進路，¹ 本文將聚焦於特定的知識，亦即某一群知識分子的論述所呈現的意識

^{*} 本論文的一部分發表於國立政治大學「中國近現代思想及文學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教育部邁向頂尖計畫、捷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等共同主辦：「語言的權力，權力的語言：概念／觀念史圖像中的文學、政治與歷史」國際研討會（2016年11月18-19日）。此國際研討會以及本論文是由捷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的“Power and Strategie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Order”計畫，以及 Czech Science Foundation（計畫：17-03529J）等所支持。

¹ 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knowledge）是在1930與1940年代間所發展出的理論。Karl Mannheim, *Ideology and Utopia: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 and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td., 1954).

形態。知識分子以其意識形態形成某些特定的社會群體。在人文脈絡中，概念創造者為知識分子，但在知識社會學，被視為行動者。本論文就要以行動者的論述觸及上述諸多議題。²用知識社會學角度來分析當時世界的一整套概念，有其特色以及優點。分析概念時，不僅要包括歷史背景，也要考慮文本的「作者」。本文雖然只集中於三位作者所寫的本體，但這三位被看作中國知識分子的代表，以及曼海姆所謂的「意識形態載體」。³知識社會學就跨越概念史範圍，而與社會和歷史上的現象連結。

曼海姆指出意識形態不同的兩重意涵。如同馬克思主義者，他以意識形態的心理特質作為混淆知識與社會現實之分野的因模，並可以在個人層次上被覺察；另一方面，意識形態也可以指稱由特定團體所採用、關於世界的一整套概念 (*Weltanschauung*)，這些概念彼此呼應且具一貫性。⁴意識形態也可作為一種政治工具而為個人所用。麥可·弗立登 (Michael Freeden) 指出，馬克思主義者主張意識形態與權力彼此關係密切的觀點，常會塑造出一群專門意識形態的創造者 (ideologues)，這一群人有時候會被視為是一群以危險任務及目標為己任的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這個詞彙在本文中將會作為一種分析工具，也就是作為一種運用在研究材料上的客位概念，加以理解共時性的社會現實。按照約翰·布魯伊利 (John Breuilly)、厄內斯特·蓋爾納 (Ernest Gellner, 1925-1995) 與安東尼·史密斯 (Anthony Smith, 1939-2016)⁵ 對於知識分子及他們在形塑民族主義上所扮演的角色所提出的觀點，

² Michael Freeden, *Ideolog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10.

³ Mannheim, *Ideology and Utopia*.

⁴ Mannheim, *Ideology and Utopia*, 49-50.

⁵ John Breuilly, *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2), 332; Ernest Gellner, *Nation and Nationalism*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Anthony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1), 93.

這些文本將區分兩種不同的知識分子，一是作為概念的「創造者」，另一則是傳播這些「創造者」意識形態架構的「專門人士」。在布魯伊利與史密斯的理解中，「專門人士」類同於「意識形態載體」。這也暗指知識分子不僅作為對世界懷抱著各自理解的個體，同時也是一群擁戴群體共同利益興趣的階級。本文將聚焦於較少為人所知的社會群體——「意識形態的載體」與他們在意識形態的創造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但並不將之視為一個階級。

「知識分子」這個概念尚有另一個我們必須加以討論的面向，即其與「國家」（作為一種權力結構）之間的關係。至於西方社會對此的理解，我們以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Said，1935-2003）近來對於知識分子的定義為例，說明其中一個極端的觀點。此觀點認為知識分子乃是超越社會支配團體及其結構與所宣傳之意識型態的公共人物。同時，他們也秉持著一定程度的道德良知，讓他們能夠指陳社會問題。他們對於所有形式的權力與權威都採取一種批判立場，並且拒絕與國家站在同一陣線。⁶ 然而，在很多狀況下很難劃分出這樣一條清楚的界線。雖然史密斯也認為知識分子不應該是尋求權力的個人，而這點理應讓他們置身於官方結構之外。⁷ 但蓋比努（Montserrat Guibernau）在對於艾利·克都理（Elie Kedourie，1926-1992）⁸ 的一篇評論中，將「官方」知識分子定義為那些「已經在國家體制中享有聲譽與地位」的人，⁹ 表示「知識分子」的定義會包含那些在國家機器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個人。

在中國，知識分子同樣散落在「支援系統與外於系統」這條想像

⁶ Edward W. Sai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The Reith Lectures* (New York: First Vintage Books, 1996), xi-xiv.

⁷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⁸ Elie Kedourie, *Nationalism in Asia and Africa*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1).

⁹ Montserrat Guibernau, "Nationalism and Intellectuals in Nations without States: The Catalan Case," in *Catalan Nationalism: Francoism, Transition and Democracy* (London: Routledge, 2004), 16.

軸線的四周，本文的其中一個目的，即在探討這條界線的彈性。自晚清時期乃至民國初期以來所發生的諸多改變，使青年改革團體挺身投入公共空間，¹⁰呼籲中國社會及制度進行現代化革新。從這個角度來說，他們確實擔負起了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由他們所發起的首波改革努力，為之後的新文化運動（1915）與五四運動（1919）所承繼，並建立起一個民國時期的知識框架。¹¹一般認為五四運動的重要性在於其帶動了世代轉變，並且就此開啟對於中國傳統文化與觀念的否定與破除。有些學者認為，這段漫長的過程繼而在文化大革命中達到高峰。¹²

知識分子的身分為何？而在建立現代國家的過程中，從一開始乃至 20 世紀初間，他們又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根據既有的研究，¹³中國本土早已發展出「知識分子」這個概念。余偉康（Eddy U）提醒我們，這個詞彙最早出現於 1920 至 1930 年代間的中國文學圈子中，接續在「知識階級」一詞之後誕生。這個詞彙指稱那些經常參與政治與文化論戰的城市與鄉里菁英分子。余偉康同時也指出，中國知識分子為士大夫階級的後裔，¹⁴亦即那些接受了嚴格教育系統的洗禮，並

¹⁰ 「公共領域……為文明社會成員之自我意識的文化與政治表述。」參見 Thomas Broman, “Habermasian Public Sphere and ‘Science in Enlightenment,’” *History Science* 36 (1998): 125。

¹¹ 例如：Vera Swarcz,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12-54, 55-93。馮兆基（Edmund Fung）也提供了簡短的概述，見 Edmund Fung, “Introduction,” in *Th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Chinese Modernity: Cultur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Republican Er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1-26。

¹² Catherine V. Yeh, “Root Literature of the 1980s: May Fourth as a Double Burden,” in *Appropri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China’s May Fourth Project*, edited by 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 and Oldřich Král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2002), 232。

¹³ 更多與這項主題相關的學術研究討論，請見 Timothy Cheek, “Introduction,” in *The Intellectual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1-28。特別參見頁 18-28。

¹⁴ Eddy U, “The Making of Zhishifenzi: The Critical Impact of the Registration

進而藉由科舉考試而部分成爲國家官員的人。他們不僅控制著由同一社會層次成員所組成之統治階級的政治與意識形態架構，同時也重新表述這些架構。士大夫也透過擔任道德仲裁者的這個公共角色實踐社會參與。這種社會參與（並不必然等同於一種批判性的反對立場，但卻可能隱含對於處於既有權力架構底下的國家與社會所抱持的各種關懷），就我看來，仍是現代中國與臺灣知識分子最爲重要的一項特質。

而針對現代知識分子，馮兆基（Edmund Fung）認爲中國知識分子社群「並非國家機制的一部分，雖然其中某些人在反對政府濫權的同時，與當時的政府關係密切或深涉於當時的政府的工作。」就他的觀點看來，他們仍是批評性的知識分子，並且「將自身視爲社會的良知」。¹⁵ 馮兆基主要是從這些知識分子的論述觀點進行論證。然而，顧昕與古德曼（Merle Goldman）¹⁶ 則從一結構性分布的角度看待這個問題，指出士大夫階級與新的知識分子群體基本上處於社會結構的同一位階。他們都受到統治階級的支配，也因此讓他們身處被夾在統治團體（來自權力場域的菁英）與被支配階級之間的兩難處境。藉著引用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的文化場域理論，¹⁷ 顧昕與古德曼認爲應該要根據個別知識分子取得其象徵資本、社會資本與經濟資本的能力（而非作爲一個同質性群體），加以評估其角色。

可能會有人認爲，通常伴隨著爲國家或民族服務的社會參與，不僅見於中國，同時也是日本知識分子的典型特徵。有馬龍夫（Tatsuo

of Unemployed Intellectuals in the Early PRC,” *The China Quarterly* 173 (March 2003): 100-121.

¹⁵ Fung, *Th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Chinese Modernity*, 19.

¹⁶ Edward Gu and Merle Goldman, “Introduc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in *Chinese Intellectuals Between State and Market*, edited by Edward Gu and Merle Goldma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4), 1-18.

¹⁷ Pierre Bourdieu,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trans. and ed. Randal Johnson (Cambridge, New York: Polity Pres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Arima) 追溯其起源至武士道與強調忠君順從的理學道德觀念。但有馬認為此特質僅見於早期自由主義者，比如內村鑑三 (Uchimura Kanzō, 1861-1930)。不過內村的神學思想「讓知識分子失去他在社會上的一席之地」，顯示知識分子與國家的分割。¹⁸ 其他的日本知識分子，由史密斯的理解則可被定義為「藝術品創作者」，或由有馬的說法為「資產階級」作家，¹⁹ 並未涉入太多國家事務。然而，隨著 1920 年代晚期，馬克思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等激進意識形態的出現，情勢有了變化，當行動者自覺地選擇成為知識分子時，他們通常會組織或投身一個政黨。²⁰ 同樣的狀況也發生在大約同一時間的中國，這個自覺的選擇促使這些知識分子逐漸成為所謂「體制內知識分子」(establishment intellectual)。

提摩西·齊克 (Timothy Cheek) 提出了「體制內知識分子」一詞，將之定義為「於列寧主義政治體制下，在最具影響力的中國都會文化圈與政治圈之間穿梭遊走的現代士大夫。他們既為高階知識分子，也是高階幹部。」²¹ 這個詞彙也解釋了知識分子在面對國家與政治權力時所處的特定位置，特別是在 1940 年代，此時，知識分子所扮演的角色相當不同於薩伊德定義下的西方知識分子，亦即獨立於國家權力之外的批判者。「體制內知識分子」一詞有其限制，在我們討論曾今可的案例時，會清楚看到這點，曾今可在尚未進入核心體制之前，已在思想層面上依附體制，搖擺於作為「體制內知識分子」與一位體制外以及為政府意識形態背書的知識分子這兩種角色之間。

在此，也許我們可以提出弗列茲·K·林傑 (Fritz K. Ringe, 1934-2006) 的「官員知識分子」(mandarin intellectual) 一詞，用於指涉「主要透過教育資格而取得地位的社會與文化精英」。在林

¹⁸ Tatsuo Arima, *The Failure of Freedom: A Portrait of Modern Japanese Intellectual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176, 21-25.

¹⁹ Arima, *The Failure of Freedom*, 178.

²⁰ Arima, *The Failure of Freedom*.

²¹ Cheek, *The Intellectual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130.

傑的定義中，「官員知識分子」包括醫生、律師、官員、政府公務員、高中與大學教師。他們基本上「與菁英的教育模式及套路有關。他們維護該團體成員所具備的教育資格標準，也在各種文化問題上作為此團體的代言人。」²² 此定義受到中國士大夫的啟發，擴大了史密斯將知識分子定義為「專業人士」的範疇，並賦予知識分子在型塑並維護世界觀上一個更為重要的角色。²³

我的研究主要探討是齊克所提到的「知識生活圈」(worlds of intellectual life)，²⁴ 包括主要的主題與關注，以此建構出這些知識分子所共享並用以解釋這個世界的整套概念。雖然他們被視為屬於同一個團體，但個別知識分子事實上代表了不同的意識形態，因此，我們可以根據他們各自獨特的論述加以區分這些團體。

如此一來，該如何區隔本文提出討論的這些行動者？不同於薩伊德的定義，他們毋寧說是各種意識形態觀點的代言人，²⁵ 而非批判者。因此，我們應該照曼海姆的看法，將他們視為「意識形態的載體」。至於他們與權力結構之間的關聯，就齊克的定義，乃是在「體制內知識分子」與「官員知識分子」之間來回擺盪。而這個團體的特質，一方面他們具有結構上的相似性（生命經驗、教育、有時甚至在職涯經歷上也常十分雷同），但從其意識形態的傾向觀之，他們所代表的團體所抱持的世界觀不僅彼此迥異，有時甚至相互矛盾。

²² Fritz K. Ringer, *The Decline of the German Mandarins: The German Academic Community, 1890-1933* (Hanover and Londo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0), 5-6.

²³ 近來由中國學者桑兵的著作指出被視為現代知識分子的「專業人士」，涵蓋範圍相當廣泛：政治人物、教育家、軍人、學生等等。參見桑兵：《清末新知識界的社團與活動》（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

²⁴ 「知識生活圈」即個別行動者所身處的文化、制度、社群，以及反映該社群的利益與關懷。

²⁵ 這個隱喻來自郭沫若在1928年對年輕人的呼籲。郭沫若：〈留聲機器的回音——文藝青年應取的態度的考察〉，收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現代文學研究室編：《「革命文學」論爭資料選編》1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2010年），頁159-160。

我選擇三位於 1945 年後渡海來臺的外省籍知識分子作為代表，他們除了在公共領域之中各自占有一席之地外，也（在某種程度上）同樣進入戰後臺灣的權力場域之中。他們分別是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教育處處長范壽康（1896-1983），代表戰後初期國家官員；臺灣師範學院院長李季谷（1895-1968），代表戰後初期的教育家；以及曾擔任多種重要期刊編輯的曾今可（1901-1971），代表出版界。曾今可所編的刊物，如《正氣月刊》和《建國月刊》，無論從文學形式或從文學實踐來看，呈現了臺灣文人圈中一個相當獨特團體的觀點。這三位各自進入了公共領域，並形塑了戰後初期臺灣的樣貌。除了他們的在戰後初期臺灣的獨特角色之外，本文選擇該三位知識分子第二個原因為他們發表文章的時期皆從 1930 年代到 1940 年代。此外，戰爭前後他們發表頻率比較高，表示他們當時的重要性。即使他們在當時文化和社會占有重要的位置，但關於戰後時期接近國家論述的外省籍知識分子研究的成果仍然不多。這三位生活軌跡當然重疊了，比如，范壽康和李季谷都參與臺灣教育，而李季谷投稿曾今可所編的雜誌，表示他們必須彼此認識。然而，本文所關注的不僅是他們作為知識分子的相似經歷，也著重考察這三位知識分子所代表的外省籍知識分子是如何形成，而其知識性與結構性基礎又為何。這三個例子也提醒我們，雖然「外省籍」或「外省籍知識分子」的詞彙常被使用，其成員不構成一個完全齊整的群體。本文第一步即是對中國知識分子論述演變的研究。

在研究他們的論述，亦即那些充滿意識形態的語言時，我希望能夠試著探測公共領域與國家機制之間的界線，以協助我們理解中國知識分子在民國晚期中所歷經的角色變化。本文將檢視他們在 1930 至 1947 年間對於文化與文學的相關論述，觀察他們觀念發展的軌跡，以及因為這段時期中國詭譎多變的政治環境，而在思想觀念上所發生的變化與波動。有趣的是，他們在這些觀念上的變動，也同樣可見之於他們的職涯發展軌跡，因此，藉著兩相對照，我們能夠更深入

了解這些行動者的動機。

二、研究方法：確認意識形態語言

本研究藉著細讀所選用的文本，確認上述每位行動者的核心詞彙。我假設了1937年（抗戰開始）、1945年（抗戰結束）和1947年（二二八事件）一定為行動者論述間的劃界。為分析該兩劃界之前後論述演變，這些作者的文本選自以五年為單位加以劃分的三個時期（分別是1935-1940、1941-1945，以及1945-1947），且選用的文本以評論為主。我同時也選擇那些談論諸如文化與文學的文章，以確保能在共同的基礎上進行比較。我會從每位作者的作品中挑選約十至十三篇文章。在分析這些作者的文本時，我發現戰前與戰爭時期的文章有其相當不同之處，因此我將文章重新按照下列時期加以分類：戰前時期（到1937年）、戰爭時期（1937-1945），以及戰後初期（1945-1947）。

我主要採批判式論述分析法²⁶加以確認關鍵字（在本文以黑字小標強調），按照我視為「語義場」（semantic fields）的不同討論主題加以分類。「語義場」是以意義串連起來的字詞群。我同時也尋找這些關鍵字的共現詞（collexemes）。關鍵字的選擇通常是基於它們出現在文本中的頻率，或是根據其重要性。以這種方式分析每篇文章，我得以「繪測」出每個作者在討論主題與詞彙上的軌跡變化，從而顯示出他們在觀念發展上的某些斷裂與連續性。有趣的是，這三位作者出現了相同的斷裂，對應著發生在社會與政治環境中的種種變化。

三、他們是誰？職涯軌跡的共通性

在我們對這幾位作者進行論述分析之前，我認為有必要略加討論

²⁶ David Machin and Andrea Mayr, *How to Do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 Multimodal Introduction* (London: Sage, 2012).

與這些行動者的生平經歷相關的一些資訊。這麼做的理由在於作者的經驗形塑了他們對於世界的理解。以齊克的話來說，形成每位知識分子所具備之世界觀的「知識生活圈」，實與其生活經驗密不可分。我會在此強調這幾位作家所共有的一些特徵。

(一) 日本求學經驗

首先，這三位行動者都在日本學習人文學科。一如郭沫若(1892-1978)、郁達夫(1896-1945)與夏禹鼎(1918年在日本成立的夏社成員之一)等其他民國時期的作家與知識分子，范壽康亦曾於1913年負笈日本就讀帝國大學文學系。根據何家焯的研究，在這個時期，他對於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與恩格爾(Ernst Engel, 1821-1896)的著作相當感興趣，也成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擁戴者。²⁷ 與范壽康生於同一年的李季谷，在畢業於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後，晚范壽康五年於1918年進入日本，而在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歷史系就讀。²⁸ 較范壽康與李季谷年紀略輕幾歲的曾今可，在1919年時先於江西省立第四中學就讀，也曾在《贛州微言日報》擔任記者。因參與五四運動後的活動，被學校退學。根據他自己的說法，他是一個流浪漢，而在十年間四處打短工生活，他存了些錢，之後也同樣到了日本就讀大學。²⁹ 同樣在日本求學並置身於類似知識環境的經歷，不僅形塑他們成為知識分子，同時也讓他們具備在戰爭結束前，以日文作為溝通語言的臺灣就任公職的基本語言能力。³⁰

²⁷ 何家焯：〈范壽康〉，《浙江檔案》第9期(1989年)。

²⁸ 王娟：〈李季谷歷史教育思想初探〉，《讀天下》2016年第13期(2016年7月8日)，頁202。

²⁹ 曾今可：〈「五四」的回憶與感想〉，《戰旗》60期，1947年，頁9；關於曾今可早期生活經驗見曾今可：〈五四運動是怎樣爆發的？〉，《浙江青年》(金華)第1卷第9、10期，1940年，頁292-293；曾今可：〈「五四」的回憶〉，《論語》第128期，1947年，頁458-459。

³⁰ 自1945年10月25日至1946年10月25日，國民政府允許省境內各新聞紙雜誌附刊日文版。一年內，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推行了一系列文化政

(二) 知識的再生產：教師與出版者的角色

回到家鄉之後，他們全都選擇擔任對於後五四運動的年輕世代來說相當普遍的社會角色：或從事出版業，或擔任教師。雖然該兩職業不同，不過在知識生產有類似的任務，即調解知識以及生產知識，也就是說，他們正是曼海姆所謂的「意識形態載體」。回到中國後，范壽康先在商務印書館任職，為哲學教育部的主要編輯。在擔任編輯的期間，他出版了九本書，主題涵蓋哲學、教育與美學。1926年，他就任中山大學的秘書長。1927年，他回到浙江並被任命為名校春暉中學的校長，並教授哲學與馬克思主義。1932年，他成為安徽大學的文學院院長。隔年，又被任命為武漢大學哲學系系主任。在他於武漢大學講學期間，他編輯了一份期刊《文哲季刊》，同時出版了一本談中國哲學史的著作。

李季谷於1924年返回中國，任教於南開大學與北京大學。1927年，他出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學校長。一年後，他前往英國深造，並在劍橋大學取得近代史碩士學位。他於1930年返國後，再度任教於北京大學，同時間也擔任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文史系主任。

曾今可的早期生涯不清楚。在自傳色彩的文章中，他提及他曾參與北伐（1926-1928年）並在國民革命軍中擔任教官。一直到1920年代晚期，他才以上海馬來亞書店經理與新時代書店的編輯等身分現身在文學圈中。他編輯了《新時代》、《馬來亞》、《文藝之友》期刊以及《文藝座談》等刊物，並將《文藝座談》刊物的意識形態定位在反左翼作家的立場上。³¹

策，要清除在臺灣所留下來的日本文化影響，即「去日本化」而施行「中國化」。更多關於文化政策的細節請參見陳翠蓮：〈去殖民與再殖民的對抗：以一九四六年「臺灣奴化」論戰為焦點〉，《臺灣史研究》第9卷第2期（2002年12月），頁145-201。

³¹ 曾今可：〈「五四」的回憶與感想〉，頁9。

(三) 在公共領域的早期經歷

在這些知識分子對於公共生活的參與上，范壽康和曾今可都相當活躍地投入當代的各種論戰中。范壽康曾參與一場激烈的科學與玄學之論戰，這場論戰主要探討、質疑科學是否能夠決定人生觀。³² 范壽康在這場討論科學主義、科學發展與現代化的爭論中，採取了中立立場。³³ 在1920年代與1930年代晚期，他也以教育學與哲學的權威自居。

就在范壽康將自己打造成為學術圈的其中一位代表時，另一方面，曾今可則活躍於文學界。曾今可所屬的知識分子團體，基本上是於1930年代間熱中於討論新文學的形式與風格的上海年輕知識圈。³⁴ 他加入國際筆會中國分會，積極參與各式各樣的社交聚會。他是位相當優秀的編輯，其《新時代》月刊成為當時相當重要的文學刊物。他也出版了多部文學作品，並如哈克斯 (Michel Hockx) 所言，他利用自己的月刊而「努力不懈地持續推廣他的作品」。³⁵

然而，他的角色最終與老一輩的新文學倡導者如魯迅 (1881-1936) 與茅盾 (1896-1981) 等有所不同。1933年2月，《新時代》發表了一份特刊，在其中曾今可建議「解放詞」。曾今可將該傳統上被視為「庸俗文學」的形式提高至新文學中的一個文類。³⁶ 他相信在將現代語言與題材帶入這個傳統韻文後，將能復興這個文類。³⁷ 如哈克斯所指出，這項建議之後，招來茅盾與魯迅一派新文學倡導者的謾罵。³⁸ 他

³² 更多細節請參見 Zuoyue Wang, "Saving China through Science: The Science Society of China, Scientific Nationalism, and Civil Society in Republican China," *Osiris* 17 (2002): 308-309。

³³ 張世英：〈「科學」與「玄學」論戰中胡適派所謂「科學」的反科學性〉，《哲學研究》1956年第1期，頁71。

³⁴ Michel Hockx, *Questions of Style: Literary Societies and Literary Journals in Modern China, 1911-1937* (Leiden, Boston: Brill, 2003), 201-221.

³⁵ 曾今可在兩年內創作了六本小說集、兩本詩集、一本詞選以及兩本散文集。參見 Hockx, *Questions of Style*, 206。

³⁶ 曾今可：〈詞的解放運動〉，《新時代》第4卷第1期，1933年，頁6-8。

³⁷ Hockx, *Questions of Style*, 211.

³⁸ Hockx, *Questions of Style*, 212-216.

們怒斥曾今可居然膽敢提議以一傳統文類作為新詩的媒介，畢竟按照一般的理解，新詩應該要揚棄老舊的傳統文學慣例。

不同於范壽康與曾今可，李季谷或許是因為長期在國外求學的經歷，在1930年之前並未參與任何公眾討論。在他回國後，李季谷首先開始出版討論歷史及史學史相關主題的著作，也自那時起開始對當代國際政治有所評論。對於李季谷和范壽康來說，他們的生命經驗，亦即身為教育者的身分，決定了他們的寫作主題與較為教誨說理式的寫作風格。

（四）中日戰爭爆發後向國家靠攏

在中日戰爭爆發之後，中國社會被全面捲入戰爭之中，我們不難想像這三位作者的路線觀點也隨而產生變動。我不能確定他們各自的確切動機——是因為各種機制日益緊縮，或是他們自發性選擇救國於存亡中——但他們的發展軌跡逐漸與國家交錯靠攏。這些知識分子運用他們的文化資本（無論是學術聲望或是文學界的名聲）提供給國家：他們不僅作為政黨國家機器的一部分，也成為政府宣傳的工具。

在國共合作的態勢成形之後，范壽康應郭沫若之邀，成為政治部第三廳副廳長，負責對日抗戰宣傳。在國民黨政府遷都重慶之後，范壽康開始與郭沫若一同為文化工作委員會工作，並擔任國際研究室主任。他隨後被任命為政治部設計委員。之後則負責為西南各省的高中編輯教材。

在中日戰爭期間，曾今可在不同的日本占領區負責政治宣傳工作。他同時也是一位文化工作者，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委員。另外，他也在中央軍校與四南游擊幹部訓練班擔任政治教官。在執行其政治宣傳任務的同時，他仍活躍於平面媒體，擔任了下列刊物的主編或主筆：《民主報》、《大成報》、《建國報》與《開平日報》。

李季谷在戰爭爆發後的第一年持續於不同的大學教書，但在這之後，他擔任了魯蘇皖豫地區的國民政府招訓委員會主任委員，該地區是位於山東、河南與安徽省交界處的戰爭區。這些設置在戰區的委員會，是爲了照顧那些失業或失學的學生。³⁹ 李季谷與當地的軍隊活動密切合作，組織各種教育活動。

(五) 戰後

精通日文可能是他們被認爲得以在戰後臺灣適任官職的主要原因。這三人都來到臺灣並且在黨國機器中占有一席之地：省政府、訓練團或大學。無論擔任什麼職位，這幾位作家都屬於支配臺灣的政治力量的一部分，而這個政治優勢也確保了他們在文化圈中舉足輕重的分量。因此，他們被關注而意見被聆聽，這也讓他們比其他社會群體更具優越性。

1945年，范壽康成爲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處長。在二二八事件之後，一如其他多位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1883-1950）的前部屬，范壽康轉任教授（臺灣大學哲學系），並兼任大學圖書館館長，直到二十餘年後退休爲止。⁴⁰

李季谷在戰後擔任臺灣省立師範學院院長。一如曾今可，他相當活躍於文化保守派的圈子中，並持續在各種報紙副刊上發表討論中國近代史與古代史的文章。1948年，李季谷就任浙江省教育部廳長。在那之後則曾任教於各高等教育學校。

在1945年後，曾今可被上海《申報》派往臺灣。他戰後的職涯發展相當類似於他戰時的軌跡：他一方面擔任臺灣省訓練團教官，很可能是與政治宣傳相關的職務，但同時另一方面，他也持續他的

³⁹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檔案 55934 號，網址：<http://web.drnh.gov.tw/scripts/newsnote/tornado/searcher.exe?s=1&z=1&k=&m=0&p=&b=55921&v=root>，檢索日期：2016年10月3日。

⁴⁰ 有關范壽康生平乃是根據何家煒：〈范壽康〉，頁9。

文化事業，主編《正氣月刊》、同一出版社出版的系列叢書《正氣叢書》，以及《建國月刊》。⁴¹ 在 1948 年夏天，他成爲臺灣省通志館主任秘書，並於該機構 1949 年進行改組之後，就任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任秘書。他相當活躍於古典詩學的文學圈子中，編輯了《臺灣詩報》。⁴² 曾今可在戰時與軍方的關係相當密切，而在戰後的臺灣，這層關係又理所當然地緊密了起來。他在戰時擔任政治教官與宣傳官員，而在戰後他與軍方菁英成員的關係主要是文藝上的往來，曾今可與他們具有相同的古典詩品味與愛好。

在我們看來，他們的生涯軌跡具有某種結構上的相似性，顯示出中國知識分子是如何回應一個危殆不安的時代。縱使程度不同，但在必要的時候，知識分子會離開公共知識分子的位置而爲國效力，也就是成爲國家及其體制的一部分，幾乎是共同的特徵。這個經驗或許也影響了他們戰後的發展，如同在范壽康與李季谷的例子中，他們繼續爲國家工作，並成爲倡導國家政策的支持者。知識分子在國家體制結構內占有一席之地，但也同時出現在公共領域中，或者倡導，或者修正國家政策，讓他們成爲「體制內知識分子」。

接下來的章節，將針對三位作者的論述進行比較式的分析，並在他們所處的社會與政治發展脈絡中詮釋這些論述。了解這些行動者的背景有助我們觀察，他們的論述中反映出多少他們事業生涯的轉折。

四、觀念的軌跡：論述分析

(一) 在中日戰爭之前

1. 共同語義場

從文本比較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中國的公共論述（毫不令人感

⁴¹ 曾今可：〈「五四」的回憶與感想〉，頁 10。

⁴² 黃美娥：〈戰後初期的臺灣古典詩壇〉，收於許雪姬編：《二二八事件 60 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臺北市政府文化局，2008 年），頁 283-302。

到意外地) 主要不脫五四運動所提出的範式。⁴³ 在此, 我主要指的是那些支配了公共論述的主題, 例如「新」與「舊」的二元對立, 以及對於「演化」(evolution) 的強調。

新舊的二元對立在我們所分析的文章中以各種詞彙代換表示。以范壽康為例, 他將「舊式的消極教育」與(隱約暗指當前) 新式的西方進步教育並置。⁴⁴ 這種結合價值判斷的並置方式, 給予作者一相當有力的工具批判當代社會的政治情勢。這個詮釋觀點可以被理解為范壽康早年參與科學與玄學之爭的延續。

在這些文本中所出現的其他重要語義場則與「發展」有關, 隸屬於此語義場的詞彙包括「演化」、「進化」、「改造」、「變化」、「漸變」、「改變」、「變動」與「革新」等, 這些詞彙全都用於論述「演化」這個 19 世紀末以來的主要議題。不令人意外地, 這個針對發展的論述常結合特定的空間方向: 「向前」,⁴⁵ 以及「向上」。⁴⁶

上述的語義場與其他諸如「現代化」和「建設」等領域相關。⁴⁷ 「建設」隱喻著創造與建立某種永久事物的過程, 並應以「改善國家」為首要目標。因此, 此議題在戰後臺灣再度浮上檯面並不令人感到意外。⁴⁸ 「建設」這個隱喻常與其他抽象概念相連。以曾今可為例, 他主

⁴³ 馮兆基認為這一連串的二分概念與兩派知識分子團體間的辯證關係有關, 亦即西化派與文化保守派。請參考 Fung, *Th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Chinese Modernity*, 27-60。然而, 這兩派知識分子的論述顯示出「新舊」之爭並非辯證關係。

⁴⁴ 比方說請參范壽康:〈現代中國教育之史的觀察(未完)〉,《晨光週刊》第 5 卷第 10 期, 1936 年, 頁 1-6; 范壽康:〈現代中國教育之史的觀察(續, 附圖表)〉,《晨光週刊》第 5 卷第 11 期, 1936 年, 頁 1-9。

⁴⁵ 「向前」與「進化」有關, 與「退行」相對; 「向上」與「增高……水準」有關, 與「被壓」相對。

⁴⁶ 從范壽康的文章中可見到這些例子。范壽康:〈現代中國教育之史的觀察(未完)〉, 頁 1-6; 范壽康:〈現代中國教育之史的觀察(續, 附圖表)〉, 頁 1-9。

⁴⁷ 比方說: 「設」、「建立」、「開設」、「設立」、「建設」、「設建」。

⁴⁸ 范壽康:〈復興臺灣的精神: 四月廿九日國父紀念週講詞〉,《臺灣省地方行政幹部訓練團團刊》第 1 卷第 8 期, 1946 年, 頁 3-4; 范壽康:〈臺灣省

張「建設文化」以為國家注入全新的精神。⁴⁹

這三位作家所共同關注的一個重要語義場為「教育」。在五四時代已經十分強調教育的重要性，藉由持續進行的變化狀態，提升道德、經濟、政治、文化條件並最終達到「新」的狀態。「教育」這個概念常和「普及」、「補充」、「頒布」、「宣布」與「改善」等動詞相連，並以「青年」為主要目標團體。該主題在范壽康與李季谷的論述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分量，這點與他們二人作為高等教育機構的教師有關。⁵⁰再者，知識分子的代表們也被期待要談論這些觀念，一如「官員知識分子」，這些知識分子也同樣肩負著重責大任，致力於倡導並維持菁英的世界觀。

這些文章讓我們可以大致了解當代知識分子是如何看待「集體行動者」(collective actors)，特別是外國。讓我們以「日本」作為例子。在1930年代早期的政治情勢底下，這三位作者都曾論及日本。我們可以看到即便日本在1931年時已進軍中國並占領滿州，這三位作者並未將日本視為一個完全負面的存在。例如。在李季谷的文章中，即便他在論及日本時連帶使用了一些帶有負面意味的動詞，⁵¹日本在他看來仍舊是一個有潛力達到發展頂峰，並能與西方相匹敵的典範國家。⁵²在中日戰爭爆發之後，這樣正面的態度也自然而然消失無蹤。

教育施政概況：對本團中央幹部學校畢業生就業講習班講，《臺灣省訓練團團刊》第2卷第5期，1946年，頁3。

⁴⁹ 曾今可：〈建設文化與普及教育〉，《汗血週刊》第4卷第4期，1935年。

⁵⁰ 范壽康：〈現代中國教育之史的觀察（未完）〉；范壽康：〈現代中國教育之史的觀察（續，附圖表）〉；曾今可：〈建設文化與普及教育〉；李季谷：〈日本之國勢及其與教育的關係〉，《中華教育界》第20卷第1期，1936年，頁35-39；李季谷：〈民族復興與歷史教育〉，《中國新論》第1卷第2期，1935年，頁27-30。

⁵¹ 比方說：「壓迫」中國、「占」我們的琉球、「割」我們臺灣，見李季谷：〈日本之國勢及其與教育的關係〉，頁35。例如，「壓迫」（我們的中國）、「占」（我們的琉球）、「割」（我們的臺灣）。見李季谷：〈日本之國勢及其與教育的關係〉，頁35。

⁵² 李季谷：〈日本之國勢及其與教育的關係〉，頁36-39。

總結我們對於所挑選的文本的觀察，公共論爭的主題仍然緊扣著那些讓中國知識分子熱中不已的主題，齊克將之稱為「歷久不衰的重要概念」。知識分子扮演了發言人的角色，必須指出那些阻礙中國發展進步、令人憂心的重要議題——從士大夫以降延續至現代知識分子的傳統。

2. 個別差異

然而，這三位作者也在各自的文章中顯示出各自的個人特色，有助於我們確認這幾位行動者在建構出的當代「意識形態地圖」(map of ideologies) 上的位置。

在范壽康的早期文章中，馬克思主義論述的存在為關鍵。在文章中常出現的詞彙諸如「生產力」、「生產」、「生產技能」、「生產過剩」、「生產關係」與「生產工具」等，⁵³ 都是馬克思理論的核心字詞。在范壽康的理解中，政治、經濟與教育都是受制於生產力發展之下的領域，而生產力則是建造一個強盛國家的基本條件，因為唯有能夠自給自足的國家，才能夠達到完全的獨立並在國際社會上取得強而有力的地位。范壽康也建議應取法俄國的計畫經濟。⁵⁴ 在談論中國教育的文章中，看到這麼多談論與「生產」議題相關的詞彙，相當超乎尋常，也的確吸引了讀者的目光。

即便范壽康使用這類語彙，但在同時他也避免採用如「階級鬥爭」等主要馬克思主義詞彙，以及「馬克思主義」或卡爾·馬克思、弗烈德里西·恩格爾等人的名字。為了理解這點，我們必須將當時其作品出版的時間(1936-1938)列入考量，當時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正組成第二次國共合作，這幾位作家們可能也是因此而採取比較和緩

⁵³ 范壽康：〈中日問題：九、中日親善的障礙何在〉，《東方雜誌》第37卷第1期，1937年，頁405-406；范壽康：〈抗戰時期的師資調整問題〉，《教育通訊》(漢口)第11期，1938年，頁10-12。

⁵⁴ 這段隱約談及俄國的段落，是唯一與馬克思主義論述直接產生連結的部分。見范壽康：〈現代中國教育之史的觀察(續，附圖表)〉，頁1-9。

的意識形態語言，並從「對方的營」挪用了某些詞彙。⁵⁵ 相較於中國人民共產黨的教條，國民黨在 1920 年代晚期至 1930 年代早期之間的意識形態主要強調超越階級考量的群策群力。⁵⁶ 這也是這兩個政黨歧異之處，即便二者皆取法蘇維埃政權。⁵⁷ 因此，馬克思主義核心詞彙的缺席，但同時又談論敵對意識形態信念的事實，可能指出范壽康事實上屬於國共合作中，作為國民黨合作夥伴的那個團體。

范壽康使用貼近馬克思思想的語言，而充滿其意識形態觀點，曾今可則在中國傳統中尋求靈感。⁵⁸ 在他的觀點中，以儒家做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在一個混亂的時代中可以成為協助國家發展成為一個現代化新興國家的跳板。這類可被視為「文化保守主義」(cultural conservatism)⁵⁹ 的態度，就他的觀點來看，也能對政治人物及政治有所幫助。他相信傳統文化不只滋養了過去，同時也會激發廣泛的愛國情懷。曾今可的論述也證實中國保守主義受到民族主義所推動。⁶⁰

⁵⁵ 如同在曾今可的例子中，他也曾在 1930 年代晚期的一段短暫時間中，使用某些與「生產」相關的詞彙，細節見後文的討論。

⁵⁶ 更多討論參考薩孟武：《三民主義政治學》（上海：新生命書局，1929 年），頁 79。

⁵⁷ Robert E. Bedeski, "The Tutelary State and National Revolution in Kuomintang Ideology, 1928-1931," *The China Quarterly* 46 (1971): 321.

⁵⁸ 在此，我們必須謹記，在曾今可所活動的文學圈子中，對於現代文化的定義成為各方行動者的角力場，也是主宰此群體論述的重要主題。

⁵⁹ 學者對於保守主義與文化保守主義的關注始於 1970 年代。在 Charlotte Furth 所編輯的專書中提及了各種不同的面向。見 Charlotte Furth ed., *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在這本書中，Benjamin I. Schwartz 提出了「文化保守主義」(cultural conservatism) 這個詞彙，用指一種充滿自覺認同中國傳統思想與文化，但卻排除明君聖主思想（社會政治面向）的意識形態現象。Benjamin I. Schwartz, "Notes on Conservatism in General and in China in Particular," 16。這個定義的第二個部分區分了文化與政治保守主義，這點仍有爭論。可參見馮兆基的討論 Fung, *Th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96-97；較為近來的討論也可見 Fung, *Th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98-113。

⁶⁰ 同樣的觀察也可見之於 Schwartz, "Notes on Conservatism in General and in China in Particular," 16。

曾今可認為某些被選擇用以構成中國民族的傳統文化元素，在中國與其他民族往來時，不僅定義了中國，同時也會協助中國重拾其在國際社會上的地位。⁶¹ 這個觀點類似於以民族另類傳統作為政治批評來源的推行「國粹」(national essence) 學派分子。然而，曾今可這番評論所針對的對象，並非帝國正統觀點(imperial orthodoxy)，而是新文化／五四運動的知識分子。因此，相較於「國粹」的支持者，曾今可並非抱持著反西方的立場，而是可被視為以較為中庸的態度延續了國民黨，特別是孫中山(1866-1925)，所採取的保守主義。⁶² 這場爭論的發展與清末民初時期的普遍變動所產生的一種認知息息相關，這個想法認為中國是必須與其他較為進步的國家競爭的次等民族。這個動態變化不僅催化了民族主義運動，也為國民黨與共產黨提供其意識形態基礎。⁶³

認為儒家思想可以成為中國新文化基礎的信念，在1930年代知識分子圈之間並非主要流行的觀點，即便有某些知識分子宣揚這類主張。著名的第一代新儒家先驅梁漱溟(1893-1988)，即主張「東方化」，以期在面對西方時保持並復興中國自身的文化認同。東方化同時也尋求為新創造之儒家思想的普世性取得全球認同的一個嘗試。⁶⁴ 他對於農村可以成為國家與民族活力更新來源的信念，也與共產主義者及其布爾什維克的農村革命模式相同。⁶⁵

⁶¹ 曾今可：〈文化與政治〉，《新時代》第7卷第2期，1937年，頁8-10。

⁶² 更多關於「國粹」保守主義者的討論，請見 Charlotte Furth 專書第二部分的論文，Furth, *The Limits of Change*, 57-168。

⁶³ A. James Gregor, *A Place in the Sun: Marxism and Fascism in China's Long Revolution* (Boulder, Oxford: Westview Press, 2000), 24-49.

⁶⁴ 根據馮兆基的詮釋，梁漱溟認為西方文化因為缺乏道德，因而必然衰敗。見 Fung, *Th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 72-76。另一方面，中國農村地區保留了「真正」中國正統儒家社會精髓。在農耕的技術進展之外，梁漱溟主張以和諧及社區建造的概念實現農村的道德革新，並促使知識分子再次積極參與農村社會。更多討論請見 Cheek, *The Intellectual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96-101。

⁶⁵ 更多討論請見 Cheek, *The Intellectual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100, 以

瑪莉·萊特 (Mary Wright) 觀察到國民黨的中堅分子，特別是蔣介石，對於同治中興 (1860-1874) 的成員有一定程度的認同感，這點在 1924 年時開始出現，逐漸發展增強，並在 1930 年代早期形成對於儒家道德準則一種表面上的固守與遵從，一直持續到 1950 年代為止。⁶⁶ 對於傳統倫理道德的認同本是為了強化國民黨以蔣介石 (1887-1975) 為首的領導正當性，並奠定一個強盛且安定的國家的發展根基。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領導核心將這些道德原則視為在革命時期的動盪不安之後，重建國家所必須的內在秩序象徵與長存不變的原則。⁶⁷ 如洛伊德·伊斯特曼 (Lloyd Eastman, 1929-1993) 所指，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黨在 1930 年代致力於發展全國性的獨裁政權，這是遍及法西斯德國、日本與史達林主義俄國各地的普遍現象。蔣介石支持經濟發展與軍事動員時，文化保守趨勢並非明確地投入政府政策，應該說，主掌資源調動以催動並完成快速變化的，仍是傳統政治文化。⁶⁸

從這個角度看來，曾今可的觀點事實上更接近國民黨的官方意識形態，而離梁漱溟的觀點有點距離。曾今可對於儒家的觀念，一如國民黨代表對於儒家思想的引用，不過是對於新中國文化的內涵多添上幾筆淺薄的評論罷了。曾今可並未進一步闡明到底應該仿效儒家思想中的哪些概念、學說教導，或該效法哪位儒家大師。

相反的，李季谷的特點則在於他對於國民政府的批判態度，這點並未見之於另外兩位作者。在為《鞭策週刊》所做的一系列編輯報告中，李季谷雖然為國民黨員，但卻針對國共在面對日本占領滿州時所採取的反應，以及國民政府在捍衛領土與保護人民上所表現出的無

及 103-105。

⁶⁶ Mary C. Wright, "From Revolution to Restor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Kuomintang Ideology,"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14, no. 4 Special Number on Chinese History and Society (1955): 515-532.

⁶⁷ Wright, "From Revolution to Restoration," 523.

⁶⁸ Lloyd E. Eastman, "The Kuomintang in the 1930s," in *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 ed. Charlotte Furth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191-210.

能，表達了深切的不滿。在他慷慨激昂的文章中，他以「袞袞諸公」⁶⁹稱國民政府，並且指明這是個只會宣傳愛國救國之口號但卻不值得信任的政府。⁷⁰他對於國際政治的論述，以許多過往的歷史事件作為佐證。曾負笈海外的李季谷身為歷史學者，以其學術權威建構其論述。抱持著如此批判態度的李季谷，若在西方可能會被視為是一位批判型知識分子。然而，他在1930年代中期放棄了批判政府的立場，轉而全心投入各項中國教育議題。

3. 風格與文本的行動者

范壽康與曾今可在風格上最大的特徵就是在他們的文本中掩蓋了行動者的存在。大多數的句子都是採取被動語態，極頻繁地採用情態動詞（「該」、「要」、「必須」、「可」等等）、存在動詞（「有」）與連綴動詞（「是」）。相較於在文中點明特定的行動者與他們所造成的變化，這兩位作者藉由將動詞名詞化、使用精簡抽象的短句，讓真正的行動者、他們的行動施為（agency）與他們的責任在文本中顯得曖昧模糊。這樣的抽象語言無論是對於這個時代，或是中國評論這種文類來說，都是相當典型的特徵。作者通常會創造一種急迫感，強調對於價值規範的呼籲，但卻無法詳述到底是誰該行動，而又該如何行動。批判式論述分析稱這個手法為「掩蓋策略」（strategy of concealing），為意識形態文章的一個標記。

李季谷的風格則略為不同。他的文本風格以談論事件、行動者及其行為為主（將過往歷史事件放置在國際政治脈絡中加以闡釋）。在「我」、「鄙見」之外，尚有如「聯合國」、「日本」、「中國」、「美國」、「英國」、「德國」與「法國」等「集體行動體」。在他的文本中，這些行動體總是與行為動詞連用（「占領」、「接受」、「使用」等），但讀者仍

⁶⁹ 李季谷：〈聯俄論〉，《鞭策週刊》第1卷第10期，1932年5月8日，頁2；李季谷：〈評政府與國難〉，《鞭策週刊》第2卷第11期，1932年10月15日，頁1。

⁷⁰ 李季谷：〈國聯之態度〉，《鞭策週刊》第2卷第4期，1932年9月25日，頁2。

不知道是誰該具體為這些行為負責。最終，一如范壽康與曾今可的文章，讀者仍面對著同樣的「掩蓋策略」。

這些作者雖然同樣關注某些在中國社會中普遍引發共鳴的重要主題，但他們的文章所呈現的某些特徵，仍讓這幾位知識分子在我們為該時代所勾勒出的「意識形態地圖」上，占有不同的位置。因此，我們可以斷論，戰前的知識分子就意識形態而言分別代表了各種不同的社會團體。

（二）抗戰宣傳（1938-1945）

盧溝橋事變（1937年7月7日）發生後，中國正式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局。在政治、社會與經濟影響之外，這個事件迫使中國需要告知民眾作戰經過與成果，而這導致戰爭報導文學與新聞的發展；⁷¹另外也要創造新的意識形態架構以動員整個社會。受救國運動動員的知識分子大聲疾呼全國上下同心抗戰。

當時有好幾份期刊都刊載抗日內容（例如《吶喊》或《抗戰三日刊》）。柯柏（Coble）指出前線新聞通常採取十分樂觀的語調，即便新聞內容本身並不那麼振奮人心。⁷² 戰爭論述的另外一個有趣特色，則是「犧牲者」的主題。作者傾向側重描寫人民的犧牲傷亡，以及日本軍隊與戰爭罪行的殘酷不仁。柯柏認為其動機是為了在中國與外國讀者之間喚起同情共感的精神。⁷³ 然而，「犧牲者」的立場恰與「救國」論述相輔相成，都以動員人民抗敵為其目標。⁷⁴

這三位作者的語義場也反映了同樣的政治情勢，有趣的是，他們

⁷¹ 更多關於報導文學的討論，請見 Charles A. Laughlin, *Chinese Reportage: The Aesthetics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特別是第四章與第五章。

⁷² Parks M. Coble, "The Legacy of China's Wartime Reporting 1937-1945: Can the Past Serve the Present," *Modern China* 36, no. 4 (July 2010): 435-460.

⁷³ Coble, "The Legacy of China's Wartime Reporting 1937-1945," 441-445.

⁷⁴ Coble, "The Legacy of China's Wartime Reporting 1937-1945."

的書寫主題與風格趨近於同一，而我們會在稍後的章節中討論他們在寫作風格上共同的轉變。特別是在為國家宣傳機器服務的范壽康與曾今可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與戰爭及軍事議題相關的詞彙日益增加：「抗戰」、「戰區」、「抗戰的力量」、「軍隊政治工作」等。在這個發展所創造出的語意脈絡中，抗戰的主題變得更為緊迫。

「新舊」二元對立與「進化」這兩個語義場轉變為「競爭」的隱喻或甚至非勝即敗的邏輯異或 (exclusive disjunction)。舉例而言，范壽康突然大量採用「競爭」的隱喻，直白地將成功與勝利⁷⁵對立於失敗。⁷⁶在中日戰爭爆發一年後，范壽康仍將日本的成功歸因於日本是更為強大而進步的國家，並在科技進展上遠遠超前的事實。相反的，中國並未達到那樣的科技發展程度，必須進行現代化方能與日本競爭。這類的態度在其後期的文章中則不復存在。⁷⁷

隨著戰爭的進展，上述的語義場逐漸融入民族主義與戰爭動員，創造出一片稠密的意義叢。且以曾今可為例。由「民族精神」所喚起的新民族文化，其目的是為了在戰爭期間灌輸人民思想並動員人民。使用與「團結」及「連結」有關的詞彙加以組構的戰爭動員論述，逐漸成為曾今可文章中最主要的論述路線。⁷⁸

對於**戰爭動員**的強調或許應和了國民黨提出的兩項倡議。其一為1939年2月發布的「國民公約」，呼籲全國同胞齊心加入國軍，與敵軍日本作戰。⁷⁹如上文所言，甫重新定義的新文化，其目的是為了

⁷⁵ 舉例來說：「跨上」現代化的大道、「夠得上」現代化國家、「成功」、「完成」、「功績」、「有成績」。范壽康：〈在抗戰歷程中所暴露的過去新教育的根本缺點〉，《民意》（漢口）第13期，1938年，頁7-8。

⁷⁶ 舉例來說：「毀壞」、「落伍」、「失敗」、「未完」、「不及」。

⁷⁷ 范壽康：〈在抗戰歷程中所暴露的過去新教育的根本缺點〉，頁7-8。

⁷⁸ 舉例來說，下列副詞極為頻繁地出現：「一致」、「緊緊地握起手」、「聯繫起來」、「組織群眾」等。曾今可：〈抗戰與文化〉，《作者通訊》第3期，1939年，頁1-2。

⁷⁹ 這場戰爭本身不僅限於軍事行動，同時也包含經濟抵制，拒絕與日本政府合作也不使用日本貨幣。此運動預設家家戶戶都會謹守這些做法，如同保甲系統，家庭成員會彼此相互監控。見〈國民公約〉，《中華百科全書》，

提醒人民 1937 年 10 月發起的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⁸⁰ 曾今可將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視為一個「橋梁」（「連結」的隱喻），結合由武裝軍隊打前鋒的第一個戰爭階段，與全國上下都該投入抗戰的第二階段。曾今可宣揚這項運動，但同時也複製了宣傳風格大量使用標語口號的特徵。⁸¹ 曾今可以非勝即敗（亦即，非生即死）這個早在 1930 年代早期就由蔣介石提出的修辭強調這個訊息的急迫性。⁸²

動員也因此與「教育」及「宣傳」密不可分，在當時甚至可說就是同義詞。我們從范壽康的文章中可見，在戰爭的壓力底下，政治與經濟教育都變得更為急迫。⁸³ 「教育」與「訓練」這兩個共現詞素暗指對於「民眾」和「軍隊」都特別施以政治教育。其目的在於增進他們的科學知識，⁸⁴ 以期達成工業與科技發展的實際目標，並提高他們的民族意識，此二者都是對日抗戰的關鍵。⁸⁵ 這篇文章的理路顯示出，因應

網址：<http://ap6.pccu.edu.tw/Encyclopedia/data.asp?id=3898>，檢索日期：2016 年 10 月 3 日。

⁸⁰ 谷小水認為此運動乃起自 1930 年代初期。在 1932 年 6 月形成具體的「安內攘外」政策，當時蔣介石正高聲疾呼民族精神的重要性。在 1937 年的盧溝橋事變之後，又再度掀起一波對於民族精神的呼籲。「民族精神」這個概念移除了早期「安內攘外」政策的意涵，轉而強調全國上下的動員（頁 46-47）。谷小水也認為民族精神的動員，應被視為在此之前出現，在納粹德國與 1934 年新生活運動影響下而產生的「民族復興運動」的延續。谷小水：〈抗戰時期的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抗日戰爭研究》第 1 期（2004 年），頁 47。

⁸¹ 舉例來說，這個運動的三個共同目標並未在他的文本中出現。然而，其風格卻顯示出其文章採用了某種口號式的公式化語言：「共同恢復我民族固有的道德，一致發揮總理革命的精神，集結於國家之上，民族之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三個共同的目標之下，各竭其能，各盡其職，以完成抗戰建國的大業。」曾今可：〈第二期抗戰與國民精神總動員〉，《浙江》（金華）第 59 期，1939 年，頁 163。

⁸² 「如果一個人沒有精神，雖然活著，也如同死了一樣；國家失去了他的靈魂——精神，名義上雖然存在，實際上也是同亡了一樣。」蔣介石：〈中國的立國精神〉，收於張其昀編：《蔣總統集》1 卷（臺北：國防研究院，1961 年），頁 588，引自谷小水：〈抗戰時期的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頁 46。

⁸³ 范壽康：〈抗戰時期的師資調整問題〉，頁 10-12。

⁸⁴ 科學的訓練科學興趣，應用科學。

⁸⁵ 范壽康：〈抗戰時期的師資調整問題〉，頁 10-12。

時勢變化，教育的受教對象由理所當然的「青年」擴充至「民眾」與軍隊。這再次說明了在危急存亡關頭動員並團結社會各界人士的急迫需要。

另外兩位作家對於「青年」則有不同的態度。曾今可在他 1930 年晚期至 1940 年代早期的文章中，多以理應成為抗日戰爭前鋒的年輕人作為對象。⁸⁶ 年輕人應忠貞於黨與社會，並且無私的為黨、為社會奉獻服務。⁸⁷ 曾今可在此以不同的說法重申了孫中山所提出的觀點：「人生以服務為目的」，而在曾今可的主張中，這點被窄化為對於軍事服務的忠誠不二。在以「青年」為主體之時，曾今可也採用了更為積極的行為動詞（相較於認知性動詞如「了解」、「知道」等），但仍伴隨著連綴動詞的使用。因此，這些動詞結構所勾勒出的並非現實，而是一幅理想的「青年」圖像。

李季谷因其所在的魯蘇皖豫地處偏遠，而有不同的觀點。他的文章顯示出，即便在偏遠地區，教化（任務）、政黨利益（動機）與在這個情況下代表國家的軍方人士（行動者），彼此密不可分。「青年」，無論是因為戰爭而失學的前學生，還是教師，或是高中學生，全都是文化教育，或說政治方針的受眾。此熱烈的教育——政治宣傳行動——讓我們想起早期的「進化」語意領域場。⁸⁸ 同時，它們也建立了一個概念框架，讓讀者可藉此尋求意義，並且藉此創造出一種，與過去的延續感。至於內容，此教育計畫聲稱遵照蔣介石於 1934 年發布的政治性政策「新生活運動」。藉著拉近與這場運動的關係，李季谷讓自身在意識形態地圖上所處的位置近於蔣介石陣營。

在曾今可與范壽康的文章中，特別可以辨識出兩位非常顯著的行動者——日本與中國，在文章的描述中分處對立的兩極。1937 年，

⁸⁶ 同樣的傾向也可見之於范壽康同時期的文章。

⁸⁷ 「為黨國，為社會服務」。曾今可：〈服務與宣傳的關係〉，《浙江青年》（金華）第 2 卷第 2 期，1940 年，頁 12。

⁸⁸ 比如說：「發揚」、「推行」、「改良」、「改進」、「提倡」。李季谷：〈邊區文教工作一年〉，《重建月刊》第 1 卷第 2 期，1944 年，頁 29-30。

中國多與一些與心理過程相關的動詞相連，如「相信」、「知道」、「理解」，以及一些帶有負面意涵的行為動詞，這些描述共同營造出一個衰敗國家的形象。⁸⁹相反的，日本則和帶有積極肯定意涵的動詞相連，創造出一個強而有力的形象。這類強而有力的**日本形象描繪**在1938年出版的其他文章中不復出現。在范壽康這個時期的文章中，比起之前，中國通常和更為積極正面的行為動詞連用。⁹⁰對於日本的稱呼也由中性轉而採用負面詞彙。在中性的「日本」或「日本人」之外，他在1939年出版的文章中更常使用「日本強盜」一詞，⁹¹而在1941年一篇具高度政治宣傳意味的文章之後，⁹²他開始只用「敵國」、「敵人」、「敵軍」、「敵政府」等詞指稱日本與日本人。值得注意的是，他漸漸傾向以集合詞彙指稱「日本」與「日本人」，這個做法壓抑了個人作為行動者的概念——這也是高度意識形態化文本的一項典型特徵。採用不同稱呼的這個轉變，同時伴隨著決定每位行為者該使用什麼動詞的調整變化。中國轉而和更為肯定積極的行為動詞相連，⁹³而日本如今則更與否定動詞連用。⁹⁴

相較於曾今可和范壽康，李季谷並未採用宣傳式的語言，即便在戰爭期間仍是以「日本」稱之。我不確定我們是否可以從這三個例子中總結出一概括性的結論，但很明顯的，和國家機構關係較不那麼密切的作者比起來，為政治宣傳部門工作的作者顯然採用了更為尖銳的修辭。

⁸⁹ 舉例來說：「非現代化」、「不能完成」、「未完成」、「看不清」。

⁹⁰ 范壽康：〈時評選輯：中國勝利在目前〉，《閩政與公餘非常時期合刊》第35-37期，1938年，頁89-91；范壽康：〈從中國持久抗戰說明到歐美各民主國對遠東問題應取的方針〉，《中國青年》（重慶）第1期，1939年，頁43-44；范壽康：〈抗戰四年來之敵國反戰運動〉，《日本評論》第14卷第5期，1941年，頁5-10。

⁹¹ 范壽康：〈從中國持久抗戰說明到歐美各民主國對遠東問題應取的方針〉，頁43-44。

⁹² 范壽康：〈抗戰四年來之敵國反戰運動〉。

⁹³ 舉例來說：（中國）「爭取」、「維護」、「抵抗」、「建國」等等。

⁹⁴ 比如：（日本）「無法自拔」、「沒有進展」等等。

在稍晚的時期中，可明顯見到作者對於行為動詞的選用，以及將之與特定的行動者連結的企圖：中國是「為自身權利奮戰」並「捍衛自身」，乃是依據法律、風俗民情與道德採取正當行動，而日本則是違背了國際法與條約，進行侵略。⁹⁵在此，我們可以聯想到本文稍早提及，以「犧牲者」這個主題作為一種論述工具，以激發國內外讀者感同身受的情懷。

的確，「正義」與「和平」在1938年後成為重要的主題，因為在國際正義與世界和平的框架中，這些理想不僅合法化中國的抗戰努力，也讓中國政府更能據理力爭國際社會支持。⁹⁶因此，在1939年及1941年，另一位行動者也加入了這場論述，亦即「世上愛好正義和平的各國」，或換句話說，也就是中國懇求提供協助的國際社會。

一如本節的緒論所言，隨著戰爭持續進行，提供與軍事進展相關的好消息的需求也隨之產生。對於資訊的選擇與調整再次指出一顯著的政治宣傳意圖。特別是范壽康的文章〈時評選輯：中國勝利在目前〉（1938）、〈目下知識青年的使命〉（1938）、〈從中國持久抗戰說明到歐美各民主國對遠東問題應取的方針〉（1939）、〈抗戰四年來之敵國反戰運〉（1941）傳達出日本戰況每況愈下的消息，並且廣為宣傳中國奮戰的正面形象。為了增添文章作為確切可信的新聞報導的客觀性，范壽康在文章放入了諸如確切的地點、數目與相關人名和地名等細節。

對於這三位作者所使用的重要主題及詞彙所做的簡短概述，引導我們做出結論。特別是在文化圈中占有一席之地之范壽康和曾今可，大可使用他們的影響力呼籲人民，傳達他們試圖宣傳的各種想法觀

⁹⁵ 舉例來說：（日本）「征服」、「侵占」、「獨霸東亞」、「建國」、「獨霸東亞」、「誘騙中國」等等。

⁹⁶ 范壽康：〈時評選輯：中國勝利在目前〉，頁89-91；范壽康：〈目下知識青年的使命〉，《戰時青年》第1期，1938年，頁6-8；范壽康：〈從中國持久抗戰說明到歐美各民主國對遠東問題應取的方針〉，頁43-44；范壽康：〈抗戰四年來之敵國反戰運動〉，頁5-10。

點。在這三位知識分子身上，我們也可以看到在權力場域中的位置，是如何實際反映出他們對於官方宣傳的遵從程度：所處地位越接近核心（曾與范），其論述就越接近官方政治宣傳主張。

（三）戰後初期臺灣

1. 更加接近權力核心

雖然范壽康與曾今可的專業意識形態軌跡在戰時相當接近，但在戰後開始出現了分歧。另一方面，范壽康和李季谷在戰後權力場域所處的位置類似，他們都被任命為負責在臺灣施行新教育的官員，而他們的論述也自然益發趨近。他們可以被視為「體制內知識分子」。曾今可則雖然仍間接與權力場域有所接觸，但卻或多或少回歸文學範圍，並且選擇和臺灣文化政策的政治性論述保持一定的距離。

文化政策，或當時所謂的文化重建，乃是致力於施行由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通常在官方《臺灣新生報》上所宣傳的「中國化」（或「祖國化」）改造過程。⁹⁷ 中國化過程中最具衝擊性的一項政策就是在臺灣實行新教育，其中最重要的是全新的高中與大學課程。相較於更具意識形態的范壽康文章，李季谷則提供了較為務實的觀點談論這些主題，以及預期會對臺灣學生產生的影響。

在這個章節中，我將選擇討論范壽康較少為人所知，為了將臺灣

⁹⁷ 已有許多學者針對「中國化」過程進行廣泛的研究。陳翠蓮與黃英哲分別以中英文對此主題進行研究與介紹，在此我將不再重複完整的論述。想知道臺灣人對「中國化」反應，請見陳翠蓮：〈去殖民與再殖民的對抗：以一九四六年「臺灣奴化」論戰為焦點〉，頁 145-201；黃英哲：〈戰後初期臺灣的文化重編（1945-1947）：臺灣人「奴化」了嗎〉，收於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編：《何謂臺灣？：近代臺灣美術與文化認同論文集》（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7年），頁 330-342；Ying-che Huang, "Were Taiwanese Being 'Enslaved'? The Entanglement of Sinization, Japanization, and Westernization," in *Taiwan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1895-1945: History, Culture, Memory*, ed. Ping-hui Liao and David Der-Wei Wa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312-326。

文化計畫介紹給中國大陸讀者的文章。⁹⁸ 范壽康作為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發言人，是如何規劃這個中國化過程，而又是那些主題獲得特別的關注與重視？范壽康在對中央幹部學校畢業生的演講中解釋了何謂「中國化過程」：其目標在消滅日本文化影響並以新的內涵，亦即中國文化取而代之。⁹⁹

日本文化影響為何危險？事實上其所指的是試圖將臺灣人轉化為日本天皇臣民的**皇民化**意識形態。范壽康特別擔憂皇民化對於臺灣「思想」的影響，因為皇民化的目的在「消滅固有的祖國思想」並植入「歪曲的意識」，壓制臺灣人對於當前中國文化的認同。那麼，就范壽康的觀點來看，該以什麼取代日本文化元素？范壽康大力鼓吹「自己的思想」基於「**三民主義的正確思想**」。就這點來說，范壽康很明顯地與國民黨的官方意識形態同聲一氣。他強調宣傳國語語文的重要性，但並未進一步闡述這點。戰後初期其終極目標中的一項為陳儀所提出的計畫——提升臺灣成為全中國的模範省。范壽康認為臺灣因為日本的影響而具備某些優勢，舉例來說，高水準的科學研究。他相信這點可以被用來加速**現代化**的進行，這點無論是在戰前與戰時，他都極力主張其迫切性。

范壽康在另一篇帶有類似演講性質，於孫中山誕辰時以教師為對象書寫的文章中，他進一步討論這點。¹⁰⁰ 其中一項重要的主題就是臺灣與中國的「團結一致」，范壽康以家庭為隱喻強調這點的重要性。¹⁰¹ 在范壽康的論述中，中國與臺灣的統一以類似思想為連結，即

⁹⁸ 范壽康：〈半年來臺灣教育的設施〉，《教育通訊》（漢口）第2期，1946年，頁5-6；范壽康：〈臺灣省教育施政概況：對本團中央幹部學校畢業生就業講習班講〉，頁3；范壽康：〈復興臺灣的精神：四月廿九日國父紀念週講詞〉，頁3-4。

⁹⁹ 范壽康：〈臺灣省教育施政概況：對本團中央幹部學校畢業生就業講習班講〉，頁3。

¹⁰⁰ 范壽康：〈復興臺灣的精神：四月廿九日國父紀念週講詞〉，頁3-4。

¹⁰¹ 與家庭相關的詞彙與表述：「祖國」、「臺胞」、「祖先」、「本省人與內地人同是一家人」、「大家都是同胞兄弟」、「臺灣是中國的一省」、「臺灣同胞也

是意識形態與情感的緊密趨近，范稱之為「精神」。他選擇以鄭成功（1624-1662）這位歷史人物為例，指他充滿民族自覺，並聲稱這正是「臺灣精神」。他也主張這樣的性質同時也是「儒家精神」，以「仁」、「義」二詞作為此精神的具體代表。他接著說明三民主義也具備同樣的性質，並將之回過頭來與鄭成功相連。以此，藉著主張民族主義、儒家思想與三民主義共享的相同本質，范壽康建構出臺灣與中國之間立基在這三者之上的象徵性精神紐帶。

李季谷的立場沒那麼明確，因他在國民黨意識形態和文化保守立場振盪。一方面，他支持清除「日本化」，也支持中國民族主義。一方面，他建議以國語教育以及史地教育取代日本文化遺產。他以為，特別歷史教育在臺灣發揚道德目標，即是孫中山所採用的儒家的道德。¹⁰²

就風格而言我們也可發現變化。不同於之前的時期，我們如今有三位主要行動者進行施作：臺灣人、日本人與中國人。這其中的每位行動者都主掌著涵蓋不同語意領域場的行爲動詞群。中國通常和「建設與發展」、¹⁰³「奮戰」、「普及」、¹⁰⁴「擔負責任」¹⁰⁵等行爲動詞，以及強調心理活動的動詞，特別與「明瞭」¹⁰⁶相連。中國也在回應並處理日本的過程中，被描述為堅決果斷的行動者。¹⁰⁷日本人則是對臺灣人民「產生」¹⁰⁸危害的源頭。明顯地，臺灣人通常居於被動立場，為其

就是中國的國民」、「共同一致的立場」等。

¹⁰² 李季谷：〈臺灣的歷史教育〉，《現代週刊》第2卷第7-8期，1946年，頁115-116；李季谷：〈我希望臺灣〉，《正氣月刊》第1卷第4期，1947年，頁4。

¹⁰³ 「建設」、「發揚」、「發展」、「改進」、「復興」。我並未深入研究此主題，但這樣的態度亦普遍盛行於戰後的捷克斯洛伐克，參考 Vladimír Macura, *Šťastný věk. Symboly, emblémy a mýty 1948-1989*. 格雷戈爾稱此意識形態為「反應性發展型民族主義」(Reactive Developmental Nationalism)。Gregor, *A Place in the Sun*, 52-58.

¹⁰⁴ 比如：「實施」、「施行」、「推行」、「普及」。

¹⁰⁵ 比如：「負起……責任」、「擔任」。

¹⁰⁶ 比如：「明瞭」、「明白」。

¹⁰⁷ 比如：「抵抗到底」、「徹底推翻」、「拔除」、「一律廢除」、「糾正」、「肅清」。

¹⁰⁸ 比如：通常使用「使」組句。

他行動者所採取之行動的承受者，¹⁰⁹或是與「是」及「爲」等連綴動詞連用。¹¹⁰

不過戰後時期的時候，國際情況自然變了，日本已不代表「敵人」了。世界進入了「冷戰」時期（雖然當時沒用該詞彙），而國共內戰從本來的小範圍突然擴大。李季谷暗示，¹¹¹中央政府「反共」不是個本地問題，而爲全球問題。同時，中華民國在反對共產勢力的鬥爭中，特別跟美國是盟友，強調中國國際間重要性。李季谷文章中，最主動的行動者爲「蘇聯」，因它跟主動動詞連結起來。¹¹²而「美國」比較跟心理活動的動詞有關，展示來自蘇聯的危機真實，而需要有所反應。¹¹³別的提到的國家沒有那麼突出，而有被動的角色。¹¹⁴

2. 再度處於想像的意識形態地圖的邊緣：文化保守主義

不同於范壽康和李季谷，曾今可並未在政府或國家機制中擔任任何職位，但作爲多份期刊編輯的身分，讓他在當時的文化圈中占有一定的重要分量。在離開權力場域後，他或許覺得不再需要推行官方論述，因此好像轉而投入他自身感興趣的主題與題材。在戰時推行政治宣傳活動的短暫插曲之後，他重新回到之前的意識形態立場，即文化保守主義。在這個階段，曾今可創作了相當豐富的詩歌作品，但對於論說性的文章則著墨不多。但即便是少量的文章亦讓我們得以了解他的世界觀。

在〈文藝作品的社會價值〉¹¹⁵文章中，曾今可並未定義何謂「社

¹⁰⁹ 比如：「受……欺騙」、「受……影響」。

¹¹⁰ 比如：「臺灣是中國的一省」、「臺灣同胞也就是中國的國民」、「爲中華民國的優秀國民」等。

¹¹¹ 李季谷：〈當前國際形勢與中國〉，《臺灣訓練》第5卷第4期，1947年，頁6-7。

¹¹² 蘇聯「支持」、「發展」、「激動」、「搗亂」、「實現」、「反對」。

¹¹³ 美國「支持」、「見」、「希望」、「反對」、「認爲」、「決定」、「不答應」。

¹¹⁴ 捷克「表示」；法國「保持……文化」；英國「是」；希臘「爲……問題」。

¹¹⁵ 曾今可：〈文藝作品的社會價值〉，《建國月刊》第2卷第6期，1947年，頁12-13。

會價值」，他僅僅列出一連串近代的文學作品。¹¹⁶ 這種以近代例子作為現代典範的作法，在文學史上並非首見。然而，我想要指出的是，曾今可刻意忽略了那些他曾在過往交鋒過的五四運動世代的同代人。¹¹⁷

曾今可的另一篇文章〈孟子的政治思想〉，或許可以更為直接說明他對於傳統文化的捍衛。¹¹⁸ 曾今可引用孟子（372-289BC）的言論，加以駁斥日本史學家佐野袈裟美，因佐野袈裟美認為孟子的目標是在於維持古典系統的觀點。¹¹⁹ 同時，曾今可主張孟子的教導與孫中山的「民生主義」一致。¹²⁰ 就其論述而言，其實際的論述內容僅引用了大量的古典儒家文本以支持其論點，比不上其書寫風格令人印象深刻。此外，曾今可也聲稱孔子（551-479BC）與孟子都是全世界所尊崇的思想家。梁漱溟（1893-1988）之前便曾提出這個觀點。¹²¹

總結我對於曾今可的意識形態軌跡的觀察，很重要的一點是，他的戰後臺灣時期乃是源自戰前與戰時時期。戰後談論文化與文學的文章，直接承襲自他 1937 年以來就已形成的觀點，認為傳統是中國文化中重要的穩定元素，值得珍惜並進一步發展。在一些因應政治上的迫切需要而作的文章，例如對政治幹部討論新建軍隊¹²² 的演講，明顯地延續了曾今可戰時的風格。曾今可的立場，無論就論述文章或文學作品（並非本文分析的對象）觀之，都與本文所討論的另兩位作者大異其趣。不同於范壽康與李季谷，曾今可並非臺灣文化政策的倡導

¹¹⁶ 最著名的例子或許是胡適，他藉由介紹以白話文寫成的近代文學經典推廣白話文學。

¹¹⁷ 曾今可在這篇文章中只提到巴金，但並非舉之作為具備「社會價值」的文學範例，而是用於證明曾今可本身在文學領域的重要性，亦即，曾今可曾對於巴金的文學風格提出建議。

¹¹⁸ 曾今可：〈孟子的政治思想〉，《正氣月刊》第 1 卷第 2 期，1946 年，頁 7-8。

¹¹⁹ 曾今可：〈孟子的政治思想〉，頁 7。

¹²⁰ 曾今可：〈孟子的政治思想〉，頁 8。

¹²¹ 「而且孟子也和孔子一樣，是為全世界所崇敬的。」見曾今可：〈孟子的政治思想〉，頁 7。

¹²² 曾今可：〈戡亂與建軍〉，《建國月刊》第 1 卷第 3 期，1947 年，頁 29。

者，相反地，他認為臺灣當地的居民無論就教育普及度或中文語言能力都在進步中。¹²³

如前所述，李季谷位置在國家論述與文化保守立場之間振盪。一方面，像范壽康所推行的，透過教育而建立強大的國家，表示他於「進化」和「民族主義」的立場。另一方面，與范壽康相反，李季谷並未強調科學重要性。相反，他常提到從過去學或從儒家道德學的必要性。如此，他的思考接近所謂的「文化保守主義」立場。除李季谷文章的內涵外，他的文化生產模式也接近文化保守主義者的模式，即他最多發表於曾今可所編的《正氣月刊》和《建國月刊》的文章以及詩歌。他文章所表現的風格也較像傳統文人的作品。比如，他用前秦歷史例子，指出之前的權力合法性問題，同時批評他當時的政治局勢。¹²⁴所選用的歷史事件及其呈現模式，顯示出在評定作者的意識形態立場時，我們不僅需要考量其內容、思想與表達的呈現方式，在什麼脈絡之下選擇特定風格與媒介亦同等重要。

戰後初期文本的論述分析再度凸顯出權力場域的位置如何影響文章主題以及文章呈現的方式：行動者越接近權力場域，越傾向認同官方宣傳。主掌臺灣省府部門的范壽康，自然是政府的宣傳者；李季谷作為大學的學院長，隱約地附和官方意識形態；而曾今可作為權力場域的圈外人，並未在論述中反映官方文化政策而是書其所欲。

¹²³ 曾今可：〈文藝作品的社會價值〉，頁 13。黃美娥也提出同樣的結論，她指出曾今可對臺灣詩人的讚賞，以及他對於臺灣詩人在面對日本殖民政府的壓力下仍然不改其志的讚賞，認為這正是他們愛國精神的展現。曾今可的觀點也因此和陳儀陣營完全相左，後者認為臺灣人民缺乏明顯的中國精神，因而需要進行中國化。黃美娥：〈戰後初期的臺灣古典詩壇〉，頁 293。

¹²⁴ 李季谷：〈讀史隨筆〉，《建國月刊》第 1 期，1947 年，頁 27。

五、結論

范壽康與曾今可的案例分析特別顯現出，在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及國共合作後，兩人於意識形態上的巨大轉變。這點影響了范壽康與曾今可對於論述主題的挑選，以及他們各自對於之前自身立場的態度。范壽康的作品顯示出一漸進的變化，但曾今可則可說是出現突然的轉變，因為他甚至譴責自身之前在文學界的種種作為。這個轉變也出現在風格上，這兩位作者都逐漸向表現出政治宣傳風格特色的標語口號修辭靠攏。

當時的文章顯示出一種日益加深的急迫感，首先是要讓知識分子投入戰爭，接下來則是平民大眾。這種急切感不僅顯示在文章的內容中，同時就語言來說，也非常明顯地反映在語義場（例如，強調團結一致的詞彙）以及對於行動施作的強調。在這三位作者的例子中，國家與民族的需要被放置在個人之前。在這三位作者於戰前最後發表的文章中，人民或群眾分別被再現為主要行動者，為行為動詞的施作主體。這點是國民黨與左派陣營的知識分子們雙邊的共識。

另一個重要的觀察則是，在如火如荼的戰爭時期，公共知識分子成為國家宣傳機制的一部分。¹²⁵ 如齊克所指出：「1940年代，國家宣傳機制的共產主義出版取代了早年的資本主義出版，成為中國公共領域的重要機制。」¹²⁶ 知識分子運用他們累積的象徵性資本服務社會，然而，在這個例子中，他們離開了他們在國家系統之外各自所處的位置，進入國家體制。在他們對國家的服務中，許多公共知識分子成為政治宣傳的幹部，范壽康和曾今可在政府系統中站高位置，而李季谷則是處於權力低層的文化工作者。他們共同形成「體制內知識分子」這個群體，而宣傳也成為他們工作的工具。這點完全不同於薩伊德定義下的「知識分子」。

¹²⁵ Cheek, *The Intellectual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125-126.

¹²⁶ Cheek, *The Intellectual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126.

另外值得指出的一點是，如曾今可的例子所示，他的認同可以隨時間轉變。曾今可從一位在文化場域的知識分子轉而成爲在戰時與政治力量關係緊密的知識分子，雖然他的政治立場沒有改變，最後又回到文學領域中，此與一些其他戰時的知識分子相同。曾今可選擇這個位置的理由並不在本文分析的範圍中，但爲了讓這幅圖像更加複雜豐富，我會略加評論他的文學創作，特別是影響他當時所從事之公共活動的文學實踐。曾今可是一個傳統詩文社團中的領導人物，這個社團中的其他詩人也分享了同樣的文學實踐，他的身邊圍繞著氣味相投習性相近的團體。¹²⁷ 換句話說，他是一群重要的時人所組成的社會團體當中的中心人物，成員們會譜寫詩文相贈，就好像他們在重塑過往傳統的文學實踐。從這個角度來說，就曾今可的例子而言，文化保守主義的立場並不僅是在知識層面上的回歸，而是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回歸過往並珍惜傳統，無論在中國或臺灣都並不新奇。¹²⁸ 從事這類過往文學活動並培育古典風格詩學的動機也因時代不同而各異。戰後初期臺灣的詩人或許不像民國初文人一般經驗到同樣的失落感與文化鄉愁，但參與文學集會可能在他們心中滋養出一種「文人感」，他們是臺灣文化風景中雅致而獨特的一角。¹²⁹

曾今可的例子特別顯示出爲何論述分析應該被放置在社會與歷史脈絡中進一步討論。只有了解知識分子所處的環境（「知識生活

¹²⁷ 在其文章中的第三部分（291-296）中，黃美娥將曾今可定位爲兩個詩人團體的中介者：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就已從事自身文學實踐的臺灣當地詩人，以及外省詩人。黃美娥：〈戰後初期的臺灣古典詩壇〉，頁 283-302。

¹²⁸ 如 Wu Shengqing 所做的評論，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文學領域中不同行動者的動機也各有不同。日本文人認爲古典詩是日本文化資產的一部分，並希望能藉此促進對於日本的文化認同，而另一方面，臺灣文人則透過詩學加強他們與中國漢文化的連結。我之後的研究計畫將有一部分會專門討論在戰後初期不同行動者的動機。Shengqing Wu, “Contested Fengya: Classical-Style Poetry Clubs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in *Literary Societies of Republican China*, ed. Kirk A. Denton and Michel Hockx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08), 39.

¹²⁹ Wu, “Contested Fengya,” 15-46.

圈」)，方能幫助我們參照其他抱持類似觀點與生命軌跡的知識分子加以定錨他們的世界觀。同時研究意識形態立場與共同的生命經驗（群體傳記學研究），讓我們可以對特定時期中特定團體的世界觀持有一更為多元而動態的理解，或者換句話說，提供了我們一個理解知識社會學的全新方式。

在未來，我希望藉著電腦化數位方式的協助，幫我們過濾數量龐大的戰前與戰後文章，以期能勾勒出一幅任何研究者單獨進行個別考察都難以企及的寬闊圖像。諸如「三民主義」、「傳統文學／文化」、「五四運動」、「民族」、「教育」與「新文化」，以及「建造」或「家庭」這類觀念的實現，似乎建構了以語言形式角力的意識形態戰場。配合以目前正在建構中的臺灣傳記本體（Taiwan Biographical Ontology，簡稱 TBIO）¹³⁰ 資料庫為基礎的群體傳記學研究，相信將能提供給我們更多全新的可能性，進一步深入這個研究問題。

¹³⁰ 資料庫還在建設中，但基本介紹可見於：<http://tbio.orient.cas.cz>。

徵引書目

- 王 娟：〈李季谷歷史教育思想初探〉，《讀天下》2016年第13期，2016年7月8日，頁202。
- 李季谷：〈日本之國勢及其與教育的關係〉，《中華教育界》第20卷第1期，1936年，頁35-39。
- 李季谷：〈民族復興與歷史教育〉，《中國新論》第1卷第2期，1935年，頁27-30。
- 李季谷：〈我希望臺灣〉，《正氣月刊》第1卷第4期，1947年，頁4。
- 李季谷：〈國聯之態度〉，《鞭策週刊》第2卷第4期，1932年9月25日，頁2。
- 李季谷：〈評政府與國難〉，《鞭策週刊》第2卷第11期，1932年10月15日，頁1。
- 李季谷：〈當前國際形勢與中國〉，《臺灣訓練》第5卷第4期，1947年，頁6-7。
- 李季谷：〈臺灣的歷史教育〉，《現代週刊》第2卷第7-8期，1946年，頁115-116。
- 李季谷：〈聯俄論〉，《鞭策週刊》第1卷第10期，1932年5月8日，頁2。
- 李季谷：〈邊區文教工作一年〉，《重建月刊》第1卷第2期，1944年，頁29-30。
- 李季谷：〈讀史隨筆〉，《建國月刊》第1期，1947年。
- 何家煒：〈范壽康〉，《浙江檔案》第9期，1989年，頁9。
- 谷小水：〈抗戰時期的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抗日戰爭研究》第1期，2004年，頁47。
- 范壽康：〈中日問題：九、中日親善的障礙何在〉，《東方雜誌》第37卷第1期，1937年，頁405-406。

- 范壽康：〈目下知識青年的使命〉，《戰時青年》第1期，1938年，頁6-8。
- 范壽康：〈半年來臺灣教育的設施〉，《教育通訊》（漢口）第2期，1946年，頁5-6。
- 范壽康：〈在抗戰歷程中所暴露的過去新教育的根本缺點〉，《民意》（漢口）第13期，1938年，頁7-8。
- 范壽康：〈抗戰四年來之敵國反戰運動〉，《日本評論》第14卷第5期，1941年，頁5-10。
- 范壽康：〈抗戰時期的師資調整問題〉，《教育通訊》（漢口）第11期，1938年，頁10-12。
- 范壽康：〈時評選輯：中國勝利在目前〉，《閩政與公餘非常時期合刊》第35-37期，1938年，頁89-91。
- 范壽康：〈現代中國教育之史的觀察（未完）〉，《晨光週刊》第5卷第10期，1936年，頁1-6。
- 范壽康：〈現代中國教育之史的觀察（續，附圖表）〉，《晨光週刊》第5卷第11期，1936年，頁1-9。
- 范壽康：〈從中國持久抗戰說明到歐美各民主國對遠東問題應取的方針〉，《中國青年》（重慶）第1期，1939年，頁43-44。
- 范壽康：〈復興臺灣的精神：四月廿九日國父紀念週講詞〉，《臺灣省地方行政幹部訓練團團刊》第1卷第8期，1946年，頁3-4。
- 范壽康：〈臺灣省教育施政概況：對本團中央幹部學校畢業生就業講習班講〉，《臺灣省訓練團團刊》第2卷第5期，1946年，頁3。
- 郭沫若：〈留聲機器的回音——文藝青年應取的態度的考察〉，收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現代文學研究室編：《「革命文學」論爭資料選編》第1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2010年，頁159-160。
- 陳翠蓮：〈去殖民與再殖民的對抗：以一九四六年「臺灣奴化」論戰為焦點〉，《臺灣史研究》第9卷第2期，2002年12月，頁145-201。
- 桑 兵：《清末新知識界的社團與活動》，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

社，2014年。

張世英：〈「科學」與「玄學」論戰中胡適派所謂「科學」的反科學性〉，《哲學研究》，1956年1月，頁71-84。

黃英哲：〈戰後初期臺灣的文化重編（1945-1947）：臺灣人「奴化」了嗎〉，收於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編：《何謂臺灣？：近代臺灣美術與文化認同論文集》，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7年，頁330-342。

黃美娥：〈戰後初期的臺灣古典詩壇〉，收於許雪姬編：《二二八事件60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臺北市政府文化局，2008年，頁283-302。

黃美娥：〈戰後臺灣文學典範的建構與挑戰：從魯迅到于右任——兼論新／舊文學地位的消長〉，《臺灣史研究》第22卷第4期，2015年12月，頁123-166。

曾今可：〈「五四」的回憶〉，《論語》第128期，1947年，頁458-459。

曾今可：〈「五四」的回憶與感想〉，《戰旗》第60期，1947年，頁9。

曾今可：〈五四運動是怎樣爆發的？〉，《浙江青年》（金華）第1卷第9-10期，1940年，頁292-293。

曾今可：〈文化與政治〉，《新時代》第7卷第2期，1937年，頁8-10。

曾今可：〈文藝作品的社會價值〉，《建國月刊》第2卷第6期，1947年，頁12-13。

曾今可：〈抗戰與文化〉，《作者通訊》第3期，1939年，頁1-2。

曾今可：〈服務與宣傳的關係〉，《浙江青年》（金華）第2卷第2期，1940年，頁12。

曾今可：〈建設文化與普及教育〉，《汗血週刊》第4卷第4期，1935年。

曾今可：〈孟子的政治思想〉，《正氣月刊》第1卷第2期，1946年，頁7-8。

曾今可：〈第二期抗戰與國民精神總動員〉，《浙江》（金華）第59期，1939年，頁163。

- 曾今可：〈詞的解放運動〉，《新時代》第4卷第1期，1933年，頁6-8。
- 曾今可：〈戡亂與建軍〉，《建國月刊》第1卷第3期，1947年，頁29。
- 蔣介石：〈中國的立國精神〉，收於張其昀編：《蔣總統集》卷1，臺北：國防研究院，1961年，頁588；引自谷小水：〈抗戰時期的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抗日戰爭研究》第1期，2004年，頁46。
- 薩孟武：《三民主義政治學》，上海：新生命書局，1929年。
- 〈國民公約〉，《中華百科全書》，<http://ap6.pccu.edu.tw/Encyclopedia/data.asp?id=3898>，檢索日期：2016年10月3日。
- Arima, Tatsuo. *The Failure of Freedom: A Portrait of Modern Japanese Intellectual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 Bedeski, Robert E. "The Tutelary State and National Revolution in Kuomintang Ideology, 1928-1931." *The China Quarterly* 46 (1971): 308-330.
- Bourdieu, Pierre.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Randal Johnson. Cambridge, New York: Polity Pres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 Broman, Thomas. "Habermasian Public Sphere and 'Science in Enlightenment.'" *History Science* 36 (1998): 123-149.
- Breuilly, John. *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2.
- Cheek, Timothy. *The Intellectual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 Coble, Parks M. "The Legacy of China's Wartime Reporting 1937-1945: Can the Past Serve the Present." *Modern China* 36, no. 4 (July 2010): 435-460.
- Eastman, Lloyd E. "The Kuomintang in the 1930s." In *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

-
- edited by Charlotte Furth, 191-21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 Freeden, Michael. *Ideolog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Fung, Edmund S. K. *Th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Chinese Modernity: Cultur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Republican Er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Furth, Charlotte, ed. *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 Gellner, Ernest. *Nation and Nationalism*.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 Guibernau, Montserrat. "Nationalism and Intellectuals in Nations without States: The Catalan Case." In *Catalan Nationalism: Francoism, Transition and Democracy*, 15-33. London: Routledge, 2004.
- Gregor, A. James. *A Place in the Sun: Marxism and Fascism in China's Long Revolution*. Boulder, Oxford: Westview Press, 2000.
- Gu, Edward, and Merle Goldman. "Introduc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In *Chinese Intellectuals Between State and Market*, edited by Edward Gu and Merle Goldman, 1-18.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4.
- Hockx, Michel. *Questions of Style: Literary Societies and Literary Journals in Modern China, 1911-1937*. Leiden, Boston: Brill, 2003.
- Huang, Ying-che (Huang, Yingzhe). "Were Taiwanese Being 'Enslaved'? The Entanglement of Sinization, Japanization, and Westernization." In *Taiwan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1895-1945: History, Culture, Memory*, edited by Ping-hui Liao and David Der-Wei Wang, 312-32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
- Kedourie, Elie. *Nationalism in Asia and Africa*.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1.
- Laughlin, Charles A. *Chinese Reportage: The Aesthetics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Machin, David, and Andrea Mayr. *How to Do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 Multimodal Introduction*. London: Sage, 2012.
- Macura, Vladimír. *Šťastný věk. Symboly, emblémy a mýty 1948-1989* [*Happy Era: Symbols, Emblems and Myths 1948-1989*]. Praha: Academia, 2008.
- Mannheim, Karl. *Ideology and Utopia: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 and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td., 1954.
- Ringer, Fritz K. *The Decline of the German Mandarins: The German Academic Community, 1890-1933*. Hanover and Londo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0.
- Said, Edward W.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The Reith Lectures*. New York: First Vintage Books, 1996.
- Smith, Anthony. *National Identity*.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1.
- Swarcz, Vera.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 U, Eddy. "The Making of Zhishifenzi: The Critical Impact of the Registration of Unemployed Intellectuals in the Early PRC." *The China Quarterly* 173 (March 2003): 100-121.
- Wang, Zuoyue. "Saving China through Science: The Science Society of China, Scientific Nationalism, and Civil Society in Republican China." *Osiris* 17 (2002): 299-322.
- Wright, Mary C. "From Revolution to Restor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Kuomintang Ideology."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14, no. 4 Special

Number on Chinese History and Society (1955): 515-532.

Wu, Shengqing. "Contested *Fengya*: Classical-Style Poetry Clubs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In *Literary Societies of Republican China*, edited by Kirk A. Denton and Michel Hockx, 15-46.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08.

Yeh, Catherine Vance. "Root Literature of the 1980s: May Fourth as a Double Burden." In *Appropri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China's May Fourth Project*, edited by 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 and Oldřich Král, 229-256.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2002.